

重庆开埠前川东市场的层级体系

周琳

【提要】可以将重庆开埠前川东地区的市场划分为四个层级：场市、商业市镇、中小型商业城市、大型商业都会，每个层级均有各自的外在特征。研究表明：重庆开埠前，川东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层级分明、覆盖广泛的市场体系。但在其中，各市场层级之间联系还比较松散，发展不均衡，使区域经济的纵向整合受到影响。

【关键词】重庆开埠 川东地区 市场层级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09)04—0136—09

一、划分市场层级的方法论探讨

(一) 划分市场层级的标准

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施坚雅开创性地提出了对于中国传统市场进行分层研究的方法，并列举了一些具体的分层指标，如：邮政系统的设置情况、各市场上的贸易统计数字、零售商品的种类和服务项目等。^①但在进行实证研究时，我们会发现：仅凭这些指标，往往不足以对一个特定区域的市场层级进行划分，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首先，施坚雅所归纳的标准（至少是文中反映出来的那一部分）并不完整。

以“铺户商人数”这个重要指标为例，施氏在文中的交代仅限于标准市镇、中间市镇、地区城市和较大城市这四个层级，而其余市场层级的情况如何却不见提及。另外，对于“中心都会”这一市场层级，在其整篇文章中并没有给予解释，这一层级究竟包括哪些城市？拥有哪些外在特征？都不得而知。

其次，施坚雅在阐述市场分层理论时，使用的是列举法，而不是归纳法。

尽管施氏细致入微地追述了许多市场层级

的外在特征，比如有多少商业店铺、上缴多少税银、出售哪些商品等等，但却始终没能点明每个市场层级的核心职能和本质特征。

再次，施坚雅所提出的一些标准并不是对所有的实证研究都同样可行。

如邮政系统就是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被引入中国，研究此前的国内市场，这个标准显然难以发挥作用。另外，全面而精确的贸易统计数字，也是中国经济向近代转型过程中才出现的新现象，要在此前的文献中找寻这类材料也并非易事。

正因为如此，对于重庆开埠前川东市场^②的分层，本文采取了以下三项标准：

其一，该市场层级中长途批发贸易所占的比重。

布罗代尔将贸易分为两个基本类型：一是所谓“透明的”贸易，往往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市场范围中进行，带来的商业利润也比较有限；二是“长距离大宗贸易”，它连接着两个市场条

^① 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03～410页。

^② 本文所考察的“川东地区”是指嘉陵江下游地区和重庆以东，以万县为中心的西南长江流域一带。

件截然不同的区域，涉及到复杂的商业运作，能使一个社会的经济成长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①所以，区别“商贩的市场”和“商人的市场”应该是一个首要的步骤。

其二，其腹地的市场发展程度。

“腹地”是指某一高级市场统辖下的相对低级市场区域。在这个区域中，所有的居民和商业网点都要直接或间接地参加高级市场中心的商业活动，接受它的计量标准和价格标准，并享受它所提供的种种服务设施。根据施坚雅的“中心地层级理论”，每一个市场层级都拥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腹地范围，而它本身又构成更高级市场的腹地。

其三，该市场所提供的零售商品种类和服务项目。

施坚雅原文中关于这方面的叙述显得过于零散，所以本文在此做一归纳：

(1) 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求的商品和服务设施（如米店、杂货铺、饭馆、旅店等）；

(2) 满足人们文化娱乐需求的商品和服务设施（如文具、纸张、书坊、戏楼等）；

(3) 满足人们高档需求的奢侈品（如皮革、绸缎、高档艺术品）；

(4) 满足客货运输需求的设施（如轿行、船行等）；

(5) 金融服务设施（如当铺、钱铺、票号等）。

一般说来，市场层级越高，零售商品和服务项目的规模就越大，种类也趋于多样化。

(二) 实证研究与理想模型的差异

施坚雅将清末民初的中国市场自下而上划分为八个层次：标准市镇、中间市镇、中心市镇、地方城市、较大城市、地区城市、地区都会和中心都会。但是具体的区域市场往往并不能一一对号入座。

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着眼点不同。施氏所划分的八个层级，是针对全国市场得出的一个宏观模型。在区域落差如此明显，涵盖范围如此之广的全国市场体系内，只有进行尽可能细致地划分，才能将所有的市

场层级尽可能全面地再现出来。但若就个别区域而言，情况则相对简单一些。我们不妨根据各区域的具体情况，划分出其独特的市场层级。本文将重庆开埠前的川东市场自下而上划分为四个层级：场市、商业市镇、中小型商业城市、大型商业都会。下文将逐级进行阐述。

二、场市

“场”是川东地区的方言，是指以满足基层民众生产、生活基本需要为目的的地方性市场。重庆开埠前的川东场市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乡村场市”和“在城场市”。

(一) 乡村场市

一个乡村场市的辐射范围，是多种因素相互协调的结果。一方面，这个范围必须要尽可能地覆盖周边的乡村。否则，相当一部分的农村居民将无法接触市场。但另一方面，其商业辐射范围又不能过大，必须要保证赶场的农民能在一天之内，在他们的居住地 and 场市所在地之间步行往返一个来回。^②

据高王凌统计：从康熙年间到光绪年间，整个川东地区乡村场市分布情况如表1：

表1 重庆开埠前川东乡村场市的分布情况

项目 地区	场数	平均每场面积 (平方公里)	平均每场 耕地数	平均每场 人口
重庆府	1208	51	25451	4550
绥定府	510	85	8151	2407
夔州府	426	71	8272	4735
忠州	104	104	8011	2304
酉阳州	164	121	4182	3792

资料来源：1 重庆府、绥定府、夔州府和忠州直隶州的数据引自高王凌：《乾嘉时期四川的场市、场市网及其功能》，收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编《清史研究集》第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4-92页。

2 酉阳州的数据引自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卷4《规建制·市镇》，同治二年刻本。

① 费尔南·布罗代尔著《资本主义的动力》，杨起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4-37页。

② 川东地区的地形以丘陵和山地为主，在本文所考察的时代，绝大多数乡村居民只能徒步出行，无法借助任何人力或畜力的交通工具，这一点对于当时川东乡村场市的分布至关重要。

由上表可知,重庆府和夔州府的乡村场市所辐射的人口和耕地数是最多的,其分布也比较密集,农民往返一次的最远路程大约为8~10公里。其余几个地区,由于人口相对稀疏,乡村场市的分布就显得松散一些。但即使在场均面积最大的酉阳州,农民往返一次的最大距离也不会超过12公里。由此可见,重庆开埠前的川东各地已经形成了一个覆盖广泛的乡村场市网络。

另外,场期也是考察乡村场市的一个重要指标。“场期”即场市上商业活动的时间安排。这是由于单个场市的购买力比较有限,对于大部分商贩来说,在各场市间进行巡回贸易往往比在某个场市上开设固定的店铺更加有利可图。而为了使商贩们的转移形成一定的规律,就必须对这些场市的交易时间进行一个巧妙地安排。一般说来,一个场市的商业贸易量越大,其场期也就越频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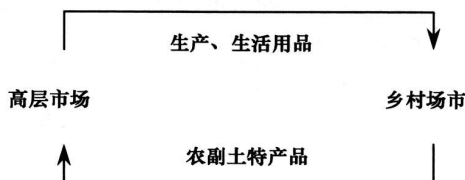
重庆开埠前的川东场市,大部分都遵循着一旬三场的时间安排方式,通常是每旬的1—4—7、2—5—8或3—6—9。然而在酉阳州,一旬两次的场期安排方式却占据着主导,往往是从1—6、2—7、3—8、4—9、5—10这五种组合中任选其一。另外,也有一旬两场和一旬三场交织的情况。如彭水县,一旬三场和一旬二场的场市大约各占一半。^①这一地区可能正处于由一旬二场向一旬三场的过渡之中。

乡村场市最基本的职能,便是在本地农民之间提供商品调剂的空间。以江北县的静观场为例:清代,该场内共有草鞋、肉、煤炭、猪、鸡鸭蛋、米、杂粮、杂品等八个专业市场。^②而在这八大类商品中,能够大量向外部市场输出的,大约只有煤炭和米两种,其余商品大多只能供应本场乡民的日常消费。

随着市场的整合,乡村场市也逐渐变成农村与外部市场之间的衔接点。如道光时期的城口厅“(商贩)以棉花、布帛、杂物于场市与四邻居民赶集交易,复贩药材、茶叶、香菇、木耳、椒蜜、猪牛等各省发卖”。^③这则材料所描述是十分典型的双向贸易:一方面,商贩从外部市场上运来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将其出售给农民;另一方面,又从农民手中收购当地的农副土特产品,贩运到更高层的市场。这样,乡村场市便进入了整个社

会商品流通的主循环之中(如图1所示)。

图1 场市贸易双向流动示意图



除了商业贸易职能之外,乡村场市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职能。场市上的人们有闲逛看热闹的、有谈天说地的,还有醪钱群饮的,甚至普通人家说媒定亲、江湖帮派聚会联络都在场市上完成。而这就决定了场市的服务职能必须是多样化的。像杂货铺、米房、油房、机房、铁匠铺、药铺、茶馆、饭馆、旅店等生活服务设施自然必不可少;戏楼、赌场、烟馆、澡堂等娱乐、休闲设施也会出现在场市之上。但由于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有限,这些服务设施的价位大都属于中低档。

(二) 在城场市

在重庆开埠前的川东地区,城市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市场形态,称为“在城场市”。当时拥有“在城场市”最多的当属合州,该城内仅猪市就有塔耳门、堤湾和南津街三处。此外,该城的城隍庙里设有米粮市、关岳庙里设有杂粮市,每天中午和傍晚还有药材市。^④

这些市场之所以被归入场市之列,原因在于:其销售的主要是农副土特产品,产销流程十分简短。如猪、大米、杂粮和药材,都是由农民生产或采集后,直接运送到城里进行售卖的。与城市商人所进行的囤积、转手、贩卖等商业运作截然不同。另外,这种市场内的贸易也是以小额零售为主。以合州城的粮食贸易为例,尽管当时城隍庙里设有米市和关岳庙内设有杂粮市,但该城中经营大米、杂粮批发贸易的店铺,则分别集中在小南门和药王庙一带。^⑤

① 《彭水县志》卷1《规建·街市》,光绪元年刻本。

② 周日照:《解放前静观镇街貌市场一瞥》,《江北县文史资料》第9辑,第104页。

③ 《城口厅志》卷3《疆域·风俗》,道光二十四年刻本。

④ 《新修合川县志》卷3《建置一》,民国十年刻本。

⑤ 《新修合川县志》卷3《建置一》。

另外，在城场市也拥有多样化的服务设施。以合州城隍庙内的米市为例，每天散市之后，“各种吃食摊子、菜馆、酒馆先后开始营业。同时在戏楼下、两廊、过道都有卖小百货和日用杂品的小摊。还有看相、算命、医病、卖药、掷骰子、赌单双等江湖骗子，有打金钱板、说评书的民间艺人”。^①

由此可见，“在城场市”的价值就在于：为城乡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商业服务。然而，这一层级的市场大多以零售业务和小规模的农副产品收购业务为主，长距离批发贸易要在商业市镇中才能得到广泛地实现。

三、商业市镇

(一) “市镇”的概念和特征

在明清经济史研究领域，“市镇”是一个歧义很多的概念。

有的研究者将其定义为“介于县城与村落之间的商业实体”。这种定义混淆了行政层级体系和市场层级体系。诚然，许多镇在商业能量上的确介于县城和村落之间，但与之相反的情况也比比皆是。以铜梁县为例：清代的铜梁县城可以说是一个较为封闭的市场，所谓“邑非冲衢，居货懋迁者勿顾焉，本地人民粟米布帛自为贩运”。^②然而其所下辖的安居镇则因位于琼江和涪江的交汇处，成为全县货物进出的必经之路，其市场的容量和服务业的种类都较县城为多。^③可见，市场层级的高低并不取决于行政层级的高低，作为商业实体的“市镇”与作为行政治所的“县城”并不具有可比性。

更多的研究者将“市镇”理解为一种“在行政层级之外自然生发出的市场秩序”。但是同样在行政层级之外自然生发出来的市场，其商业发展程度却可能存在巨大悬殊。有的“镇”由于商路改道、竞争失利等原因，其市场逐渐衰落；而有的镇则会因为交通地理优势或生产专业化而迅速崛起。明清时期江南的许多市镇，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群芳争艳型的工商业城市”，^④而明清时期的佛山、汉口等巨镇，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国内

屈指可数的商业都会了。这样一些市场显然不可能放在同一个发展层级中进行考察。

笔者认为，就重庆开埠前的川东地区而言，一个商业市镇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职能：

一方面是汇总周边各乡村场市上的产品，并以批发贸易的形式将其运送到高层市场。

如永川的朱沱镇是该县最大的粮食集散市场，“各场镇、农村粮食都像潮水一样涌到朱沱，陆路的牛驮、马驮、人挑，水路的大船、小舟运输，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管天晴落雨，没有一日间断。尤其是在新粮上市以后，载运不绝于途，虽至半夜，还听得马铃叮当之声”。^⑤又如彭水的万足镇，从道光年间便开始发展生漆业，生产的生漆“每年春秋两次外运，每个商号，有的一次几百桶，有的上千桶，每桶重75公斤，由‘歪屁股’木船运至涪陵，‘提过档’转由长江‘舵龙子’帆船外运，每次结成船队，真有浩浩荡荡之势”。^⑥

另一方面则是大量购进外部市场的商品，并分发到其下属的各乡村基层市场。

各商业市镇一般都位于交通要道，如开县的临江镇，既位于南河和映阳河的交汇处，又是通往万县、万源、宣汉、达县的陆路必经之地，外地商品要进入开县各乡村场市，大都要经此镇转运。^⑦又如涪陵的蔺市镇，在乾隆中期时，便已有两条五尺宽的石级大道，方圆二百里内各乡村场市所需的盐糖食品及日用百货均由这两条干道运去。^⑧

由此可见，商业市镇实际上充当着乡村场

① 周成文：《合川城隍庙今昔》，《合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22页。

② 《铜梁县志》卷1《地理志·风俗》，光绪元年刻本。

③ 吴继台：《浅说涪江安居航运》，《铜梁文史资料》第6辑，第32页。

④ 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上）》，《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⑤ 赖鼎宜：《朱沱见闻散记》，《政协永川县委员会文史资料汇编》第7辑，第3页。

⑥ 肖尧荣：《万足历史事件追忆》，《彭水文史》第9辑，第126页。

⑦ 王宜君等：《临江镇市场掠影》，《开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60页。

⑧ 蔺同：《蔺市镇》，《涪陵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149页。

市与外部市场之间的一个运输器。一方面使得分散在各乡村基层市场的农副土特产品上行到更加广阔的外部市场之中；另一方面也使各个乡村市场得到定期的补给，不至于成为茫茫商海之中的孤岛。

商业市镇的第三方面特征，在于其服务业的扩充。

明显的是仓储物流设施的增加。由于商业市镇货物吞吐量相对较大，很多交易并不能于当日完成，因此集食宿和仓库为一体的栈房便应运而生。以荣昌县的昌元镇为例，每到猪市开市的头一天，该镇上的兰家栈房便形成爆满之势，“每床二客仍不足安置，猪婆堆积有似牌坊”。^①

与大宗批发贸易相适应，市镇上出现了一批专业的商业中介人。如昌元镇，仅猪市上就有掮客（也称“偏耳”）几十个。^②他们“在袖笼子里摸手指讲价钱，局外人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价格成交的，也许买方卖方所了解的价格都不一样。大宗的买卖，即用纸包样讲价，成交后按样品出货。”买卖猪牛，由“偏耳”带到卖家先看猪牛，就地当面讲价成交。^③

与普通的场市相比，商业市镇的文化市场也更加充实。其中一般都拥有固定的书坊，有的还设有印刷铺、装裱铺等。娱乐设施尽管在市镇和场市中都能看到，但其档次却明显不同。以戏楼来说，场市上演戏大多是在茶馆或露天进行。而市镇的戏楼却往往具有相当的规模。如永川县的陈食场，从清代中期起便建有禹王庙、关帝庙、南华宫、万寿宫四处戏楼，年年演戏，沿袭了两百多年。^④

由此可见，从市场发展的角度来看，“市镇”的定义应该是：在农村基层市场与外部高层市场之间进行转枢贸易的中间市场层级。

（二）手工业市镇

在重庆开埠前的川东地区，手工业市镇十分罕见，略有可观的有以下几个：

井盐业市镇：这些市镇主要集中在三峡沿线，规模最大的当属云安盐厂。在咸丰年间之前，该厂的生产规模就已达到“卤井皆资钜万”。而咸同年间“川盐济楚”时，该厂所产井盐更是“值骤高扬”，“连樯下驶”。随着井盐的大量外销，其周边地区遂发展成为一大巨镇，商业最兴盛时

“金钱充牣，坐致四方之货，水陆辐凑，琛资交错，灶户奢侈，声伎锦玉之玩似于维扬。”^⑤

五金业市镇——大足龙水：该镇的日用小五金生产始于康熙末年，嘉庆时期，该镇“比屋人家以冶为业，当炉火纯青，铮铮四起，非丝非竹，余韵铿锵，直疑天台赋手，从玉口中齐出，掷地金声”。^⑥其产品包括剪刀、剃刀、铁锁、叶烟斗、剥刀、条铁、熟铜制品等十几个门类，畅销全川及陕南、陇东、云、贵北境。

制扇业市镇——荣昌县城：荣昌的折扇生产发轫于乾隆时期，嘉庆年间开始由副业生产转向专业生产。同治、光绪时期，已有串子、排元、苏洋漆等三十多个花色。光绪时城中扇铺达二百多家，生产半成品的摊子老板百余户，有两千多人专业从事扇业生产，年产各种折扇四百万把，远销云、贵、陕等省。^⑦

四、商业城市

本文将重庆开埠前的川东城市，划分为“中小型商业城市”和“大型商业都会”两个层级。由于这两个层级之间颇多可比之处，故将其放在同一章节之中进行阐述。

因篇幅所限，本文挑选了三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中小型商业城市——合州、涪陵和万县进行重点介绍。至于“大型商业都会”，唯有重庆可与之相符。下文将从相似性和差异性的角度，对这两个市场层级展开论述：

（一）中小型商业城市与大型商业都会的相似性

其一，与场市和商业市镇相比，城市的商业运作过程更加复杂。以合州的粮食贸易为例，

①② 杨宗昆：《荣昌地区川剧今昔》，《荣昌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150、150页。

③ 王国璜：《建国前永川经济漫谈》，《永川文史资料选辑》，第82页。

④ 张义富：《陈食场的川剧》，《永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191页。

⑤ 《云阳县志》卷23《族姓》，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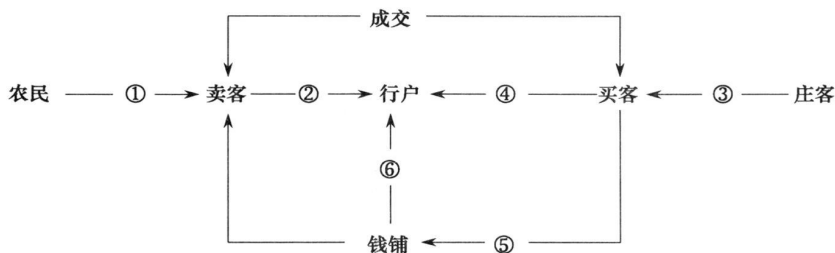
⑥ 杜受祜、张学君：《近现代四川场镇经济志》第2集，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82页。

⑦ 田学诗：《具有荣昌特色的荣昌折扇》，《荣昌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66页。

从粮食的收购到运销大致上可以分为六个阶段，其过程如图2所示：

图2

清代合州城粮食贸易流程示意图



资料来源：据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卷23《商业》制成。

这六个步骤分别是：1 卖客从农民手中收购粮食；2 卖客将粮食运送到合州城，并将米样存放在作为中介商的行户处；3 城内经营米粮业的富商大贾（即买客），通过设在各处的庄客，得到邻近各产粮区的价格信息；4 买客确认购进某处的粮食有利可图时便联系行户，以查看货样并商讨价格；5 价格谈妥后，买客将银钱存入钱铺；6 钱铺代买客向卖客兑现货款，并向行户支付佣金。

与商业市镇的批发贸易相比，我们可以发现：城市中的大宗商品贸易一方面切断了买者与卖者的直接联系，另一方面则容纳了更多的竞争者，提供了更丰富的商业信息和更多的商业机会。

其二，城市的商业活动更加规范化和组织化。重庆开埠前，川东地区各场市和商业市镇上，拥有行帮组织的并不多。然而城市中的各行各业，却已日益形成一个严密的组织系统。据嘉庆《巴县档案》记载：“盖闻渝城，川省兴隆之地，三江之头，五路出入之所。万物云集，百艺起兴，士农工商，各受一业。大小艺业，俱有规例，以遵前人之教”。^① 在该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磁器、丝棉、打草纸、泥瓦匠、杂粮、冰桔糖、纽扣、烟草、弹花、织布、靛青、阉猪等十几个行业的行规。明确规定了该行业经营商品或服务的种类、交易的地点、货物的价格、行帮的组织结构、劳资关系以及从业者的职业道德等。^②

另外，作为一个移民地区，清代川东地区经商阶层的构成是比较复杂的。但是来自于不同地区，从事不同行业的经商者之间，却往往表现出一种积极沟通的倾向，这一点最集中表现在重庆城的“八省客长”这一机制上。所谓“八省客长”是来自八个省份的移民们分别推举出来的领袖。尽管他们的身份颇似同乡会负责人，但实际上其影响力却远远超出了乡谊圈。如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三月，重庆机房业发生了机主汪正兴等人与匠师熊立富等人的劳资冲突，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八省客长”出面调停。最后，双方共同接受了由“八省客长”所制订的“一千文合银六钱六分”的工资标准，并声明“日后钱价无论高低，亦照合算，永定章程。”^③ 这一事件说明，“八省客长”实际上已经发挥着仲裁组织的作用，城市商业的规范化和组织化，与其关系甚大。

城市商业活动的规范化和组织化，还体现在中介商人的整合上。城市中的中介商与商业市镇上各行其是的经纪不同，他们大多加入牙行并接受地方官府的监管。据记载，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重庆城内的领帖牙行就已达152家。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为了杜绝牙商弄虚作假，巴县（即重庆）衙门向各行户颁发了一种三联票，此票“骑缝钤印，编例字

①②③ 四川档案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6、233~256、249~250页。

号,发给各行,若遇交易,将货与价数注明票内,约期清还,其票一截给卖客,一截给买客,一截存行户之手,买者与卖者见面,行户不得高下其手矣,符票而后兑银,行户不得私收其价矣”。^①

其三,商业城市的服务行业也更加完善。就当时的川东城市而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金融和邮政服务与长距离大宗贸易的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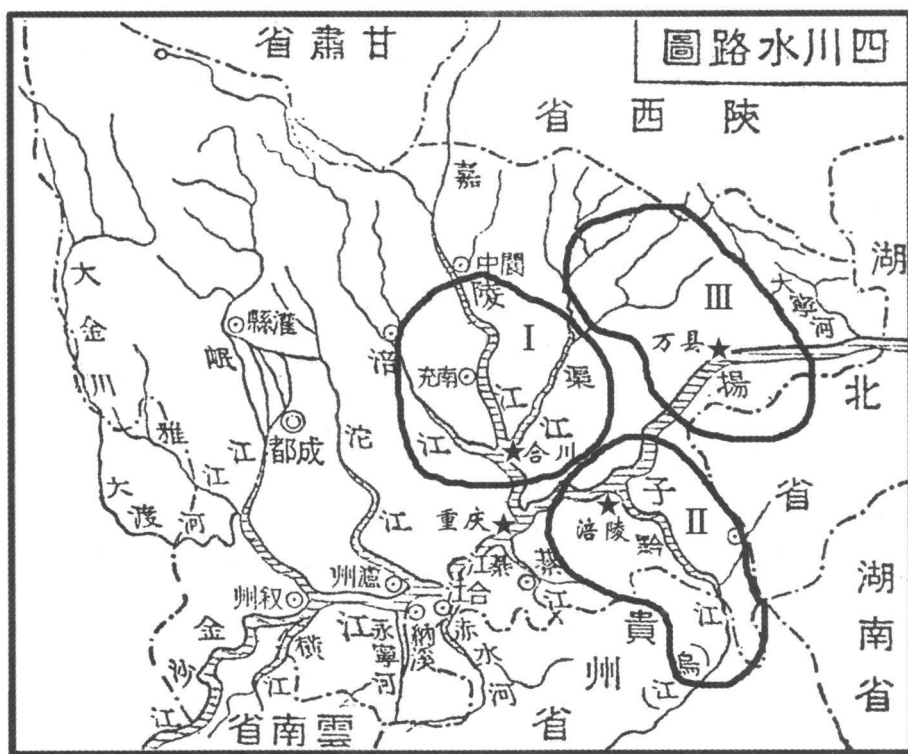
重庆开埠前,川东城市金融服务最引人注目的发展在于资金长途汇兑,提供这项服务的主要是票号。到1891年重庆开埠前夕,重庆的票号已经达到16家,“实际上垄断了一切邻省的主要银行业务,……它们在广州、长沙、汉口、贵阳、南昌、北京、沙市、上海、天津、云南府、芜湖等地都设有汇兑代办处”。^②这样一来,

各商号在异地办理大宗的批发业务时,只凭借票号开具的汇票,便可在其汇兑处支取巨额资金,避免了携带大量金银带来的种种不便。

重庆开埠以前,现代邮政体系还没有进入川东地区,但当地已经有了16家私人经营的民信局。不仅可通达成都及四川省48处重要城市和乡镇,还可承接与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省之间的邮政业务,^③极大方便了区际商业贸易的进行。以云、贵、川之间的食盐贸易为例,清代中前期,滇东盐区的商号、票号与川黔两省的盐商、银钱帮之间的信函往来,大多是由马帮传递。但随着业务量的增加,需要更快速的商情交流和帐单传递。这时,民信局便凭借其迅捷的传输效率和可靠的商业信用,承

图3

清代四川水路图



资料来源:引自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4页。

① 《巴县志》卷3《赋役·课税》,乾隆二十六年刻本。

②③ 霍伯森著《重庆海关1891年调查报告》,李孝同译,《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36~237页。

揽了这一批业务，从而成为川、滇、黔之间重要的贸易沟通渠道。^①除传递信函之外，民信局还介入了资金长途汇兑。在同治末年到光绪初年期间，麻乡约民信局每年为所寄递的汇票和汇款，最多时可高达三百万两白银。^②

总而言之，金融服务和邮政服务的扩充，使市场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上都极大地拓宽了。

（二）中小型商业城市与大型商业都会的差异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合州位于嘉陵江、渠江、涪江的交汇之处，在重庆开埠前，它的贸易辐射范围大约相当于此图中的 I 号区域；涪陵位于长江和乌江的交汇之处，它的贸易辐射范围大约相当于图中的 II 号区域；万县在当时的川东区域市场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充当着巴山老林地区和三峡沿线地区最重要的贸易口岸。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贸易辐射范围大约相当于图中的 III 号区域。但它还是一个省际贸易中转站，在长江航道中恰好位于重庆和宜昌的中间点，从湖北的利川、恩施，湖南的龙山都有陆路与之相通，“凡由鄂溯流入蜀行销川北货物多由此转运，由施南、利川陆行入蜀者，亦必会于此”。^③所以，当时的万县实际上已出现了突破中等商业城市的种种迹象。

如果将上图中的各条水运交通路线比喻成一棵枝杈纵横的大树的话，长江和嘉陵江无疑充当着这棵大树的两条主干，而重庆则恰好位于这两条主干的交汇之处。因此在当时的川东经济区内，上图中所标明的三个区域，全部都属于重庆城的商业腹地。

除区域内的贸易之外，重庆还与其它经济区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早在乾隆时期，重庆城内就已经是“吴、粤、滇、黔、秦、豫之贸迁来者，九门舟集如蚁，陆则受廛，水则结舫”。^④据英国人在重庆开埠之前所做的调查，当时重庆常见的木船大约有 48 种，来自川西、川南、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等不同地区，经营的商品包括米、盐、糖、百货、药材、木料等各个门类。^⑤

通过上面的叙述，可以归纳出中小型商业

城市与大型商业都会的差异：

1 从地理位置上看，大型商业都会应位于整个经济区的水陆交通中心，与本经济区内的每一个分区都拥有着比较便捷的贸易路线，并能最大限度地保持本经济区与外经济区之间的贸易交往；而中小型商业城市则位于该经济区中某一个分区的水陆交通中心，负责将这个分区与整个经济大区的中心城市连接起来。

2 从货源上看，大型都会城市不仅要集中该经济区中每一个分区的商品，来自于其它经济区的大量商品也要在此销售或运输。而中小型商业城市则是负责集中该经济区中某一个片区的商品，把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运销到都会城市，并从都会城市中获得商品，以供本分区之所需。

3 大型都会城市可以长时期、大规模地与国内其他地区的市场形成交流，而中小型商业城市的贸易则基本限定在本经济区之内。

结论：重庆开埠前川东市场的成就与缺憾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重庆开埠前，川东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层级分明、覆盖广泛的市场体系。在其中的每个层级之中都进行着相当数量的双向贸易。生产和贸易都不再仅仅是为本地消费而进行。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各种市场层级的运作处于一种理想状态。罗仑、夏维中将明清时期江南集镇划分为“集散型”和“专业型”，^⑥所谓“专业型”即指将商流、物流与专业化的商品生产结合得较好的市场层级，它往往与腹地之间保持一种比较紧密的关系，高

①② 四川省交通志编辑组：《西南民间运输巨擘“麻乡约”》，《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7 辑，第 136~139、138 页。

③ 周洵：《蜀海丛谈》卷 1《制度类上》，民国三十七年戊子排印本。

④ 《巴县志》卷 2《建置志·乡里》。

⑤ 霍伯森著《重庆海关 1891 年调查报告》，李孝同译，《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6 辑，第 235~236 页。

⑥ 罗仑、夏维中：《明清时代江南运河沿岸市镇初探》，《南京大学学报》1990 年第 4 期。

层市场的发展能够带动低层市场的发展。而“集散型”则指仅侧重于商流和物流的市场层级，与其腹地的关系松散得多，一旦集散任务完成，其相互关系就暂时宣告结束。

重庆开埠前的川东市场大多属于“集散型”。各个市场层级之间大部分时候是靠自下而上的农副土特产贸易，以及自上而下的生产、生活必需品贸易结合在一起。农副土特产贸易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和分散性，不利于各市场层级之间形成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而生产、生活必需品贸易又具有很大的雷同性，不利于各市场层级间形成优化的流通格局。另外，在这种“集散型”的市场格局之下，各层级的市场必然会更加注重面向高层市场的“集”，而相对忽视面向低层市场的“散”，这就必然造成越高的市场层级发展越快。以重庆为例，在本文所考察的两百多年间，它由一个一穷二白的空城，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近十万人，数十个商业门类的大型都会城市。^①而大多数位于该市场层级底端的乡村场市和商业市镇既没有条件与区域之外的市场进行直接地交流，也不能与本区域中的高层市场形成深层次的经济互动。因此，在重庆开埠前的川东市场体系中，出现了高层市场与底层市场之间的明显落差，区域经济的

整合仍显薄弱。

[导师仲伟民教授点评]

这是一篇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论文。首先，文章对施坚雅的市场层级理论进行了修正，认为施氏理论只是一个宏观的理想模型，并不适用于许多具体的地区；其次，根据新修正的理论，提出了新层级理论，并运用这个理论对重庆开埠前川东市场进行深入剖析；再次，文章对许多经济史常用的一些概念进行了辨析，有独到之处。文章的结论有新意，如认为重庆开埠前川东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层级分明、覆盖广泛的市场体系，但比较而言，区域经济的整合仍显薄弱。

本文作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2006
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赵俊

① 林成西：《清代乾嘉之际四川商业重心的东移》，《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郑维宽：《清代川东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The Market Layer of Eastern Part of Sichuan Province before the Founding of Chongqing Customs

Zhou Lin

Abstract: Before the founding of Chongqing customs, the market in eastern part of Sichuan Province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layers, namely, “bazaar, market town, middle and small commercial cities as well as large metropolitans. Every market layer has its own characters and dividing criterions. This study proves that before the founding of Chongqing customs the eastern Sichuan economic region has already established a large market system,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clear-cut layers and wide coverage. But there also existed some bottleneck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se layers is fairly loose; the developing pace of every layer was not even. These factors affected the overall developing level of this economic region.

Key words: the founding of Chongqing customs; eastern part of Sichuan Province; market layer